

圍牆

(2016 年 3 月)

香港大學是一所開放的、面向社區的大學，沒有圍牆與大門，任何人均可自由出入，甚至教室也可外借，警方進入校園執法需徵得校方許可。整個校園由不同建築自然有序地合圍而成，身處其中需遵守港大校規，校園內禁止吸煙，否則將處以罰款。地鐵開通前，不少校外人士會來到香港大學的學生食堂吃飯，方便又實惠。地鐵開通後就餐人數劇增，導致學生無處用餐，才對訪客加以限制。其實在歐美國家，許多大學也一樣不見圍牆，融入社區，面向公眾開放，世界名校哈佛如此，斯坦福也如此。

自由、獨立、多元、開放

香港大學一直提倡自由、獨立、多元、開放。學術自由對大學而言至關重要，早在 1915 年，美國大學教授協會

(AAUP)^①就提出了學術自由的重要性，大學教授進行學術研究和在教室授課不受干涉。獨立的思想是大學的財富，也是大學具影響力的基本前提。香港大學有一半教授來自全球各地，大家的思維方式各有不同，這就要求大學必須提供開放的環境。但近年來，我們推崇的這一原則也屢遭破壞，其中最觸動我的，就是最近發生的一件事。

不久前，兩位內地學生在飯堂排隊買飯的時候無端受責。一位香港本地學生指責他們搶奪了香港的資源。這一場面被人拍攝下來並上傳網絡，拍攝者係香港本地居民，他同時發了一篇文章，希望視頻傳播熱度有限，不願太多人看到香港大學會發生這樣的變化，也懼怕身為香港人因支持內地人會受到責難。

這一幕讓我十分觸動。港大雖沒有圍牆，但身處其中的人是否已經在心中築起“心牆”呢？這讓我非常擔心，香港大學是否失去了以往的寬容？許多人不夠謙卑，不懂尊重他人，甚至不誠實？但我必須強調，今天我能夠在香港大學內公開發表這些觀點，甚至批評港大自身的問題，這恰恰說明港大的學術獨立與言論自由受到保護。同時，我也必須強調，你們在內地聽到有關港大的信息是不完整的，也是不準確的。港大的確面對前所未有的危機，發生了一些令人擔心的變化，不過我相信，如果我們秉承開放的思維和獨立的思考，問題終究可以獲得解決。

① 美國大學教授協會（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s，簡稱 AAUP）成立於 1915 年，是一個由教師和其他學術專業人士組成的非營利性會員協會，總部位於華盛頓特區。該協會的主要宗旨是推動和保障高等教育的學術自由，確立高等教育的基本專業價值觀和標準，並維護教師的經濟安全。

圍牆能帶來安全與自由嗎？

建造圍牆是源於危機感。不管是建長城、柏林牆還是防火牆，都是因為缺乏安全感，怕受到侵犯，怕利益受損。1961年建造的柏林牆最能彰顯人類的恐懼心理。1990年秋天，我來到柏林時，世人皆知的柏林牆已經倒塌。從1961年8月一直到1989年11月，這道牆把柏林這座城市分為東西兩部分。30多年歲月中，5,000多位東德人不惜冒着被士兵射殺的危險跨過這道牆。1989年11月，最後一位越過這堵牆的東德人被東德士兵槍殺死亡，柏林牆就此倒塌。

自此之後，我們進入快速全球化的進程，可是越全球化，全球各地的圍牆反而越建越多。據《華盛頓郵報》2011年的一篇報導，柏林牆倒塌後，尤其是“9·11”事件發生後，全球各地建造的圍牆數量大幅度上升。美國曾經是“移民天堂”，向全世界的移民開放，如今為了擋住來自墨西哥及拉美的移民，美國在美墨邊界上建了圍牆。朝鮮半島的“圍牆”隔離了南北方，豎立的鐵絲網隔斷了同一個民族幾十年的自由來往。在南亞次大陸，印度與孟加拉之間有圍牆，印度與巴基斯坦之間也有圍牆。在塞浦路斯，一個國家被一道牆一分為二，隔離了生活在島上的希臘與土耳其兩個民族。在北愛爾蘭首府貝爾法斯特建立的圍牆，將同樣信仰基督的天主教與新教徒分開。在巴格達，同為穆斯林，圍牆把穆斯林遜尼派與什葉派分在城市兩邊。西班牙在北非的兩塊飛地梅利利亞和休達也建造了圍牆，防止非洲人越境前往歐洲。過去幾年，敘利亞內戰引發的難民一撥又一撥地衝向歐洲，許多國家都建立了圍牆，阻止這

股難民潮。

我在耶路撒冷可以見到不少圍牆豎立在阿拉伯與猶太社區之間，將猶太人與阿拉伯人分開，以色列希望藉此堵住恐怖活動。從特拉維夫往北到海法的高速公路上，可以看到東邊阿拉伯人社區與地中海邊上猶太人的城市近在咫尺，以色列建了圍牆，只留下狹窄的通道，防止炸彈襲擊。雙方在 1993 年簽署《奧斯陸和平協議》^❶ 後，迄今依然看不到和平的曙光。正因為巴以衝突才會出現“9·11”恐怖襲擊，才會出現 ISIS^❷ 這些激進的恐怖組織。

圍牆不可能給我們帶來安全感，更不可能帶來自由。圍牆恰恰製造恐懼與仇恨，擊破圍牆需要良知與人道，攻破圍牆需要開放與自信。

圍牆恰恰製造恐懼與仇恨

從 1945 年到 1961 年，有 350 多萬人離開東德，投奔西德，知識分子和技術人員佔其中半數比例。他們逃離的原因很簡單：追求自由和美好的生活。東德政府決定在 1961 年建立柏林圍牆，但之後有高達 5,000 多人冒着被射殺的危險跨過這道長達 199 公里的柏林牆。1990 年我漫步在已倒塌的柏林

❶ 奧斯陸和平協議是 1993 年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在挪威奧斯陸秘密談判後簽署的和平協議。該協議承認雙方合法權利，為解決巴勒斯坦問題奠定基礎。後續執行中面臨諸多挑戰，包括極端勢力襲擊、領導人遇刺和談判停滯等問題，該協議已失效。

❷ ISIS (Islamic State of Iraq and Syria, 伊斯蘭國) 是個極端恐怖組織，其前身是 2004 年成立的“伊拉克基地組織”。ISIS 以暴力和恐怖手段著稱，實施大規模屠殺、綁架、斬首等暴行，製造了巴黎恐怖襲擊、布魯塞爾爆炸等多起震驚世界的恐怖事件。

牆，東西兩側看到的是完全不同的兩個世界，西柏林是個繁華的都市，東柏林則是一片衰落與破敗的景象。我一個外國人漫步彼處，都能強烈地感受到東、西柏林的巨大不同，相信生活在其中的人自然有比我更強烈的感受，他們更了解自己的選擇。柏林牆無法堵住人們對自由的嚮往，這道牆最終轟然倒下了。

柏林牆建成後，肯尼迪在 1963 年來到柏林，發表了著名的柏林牆演說。他說：“世界上的圍牆都是防止外面的人闖進來，只有一種圍牆是防止裏面的人出去。那是什麼？那就是監獄的圍牆。”他又說：“自由有許多困難，民主亦非完美，然而我們從未見到一堵牆把我們人類關在裏面，不准他們離開。”他還說：“只要一人被奴役，所有人都不自由。”在他發表這段演說 36 年後，柏林牆轟然倒下。我們看到的柏林牆，以及在以色列看到的隔開猶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間的圍牆，兩者之間是多麼相似。圍牆其實是製造恐懼與仇恨，權力的最大同盟者就是恐懼。通過恐懼的手段來鞏固權力，是許多專制政權的共性。

除了政權，社會中也同樣有人設置圍牆、通過製造恐懼來達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過去幾年，香港發生了不少排外事件，究其原因，其中一個是香港的貧富懸殊日益嚴重，數量相當龐大的底層群體看不到未來，尤其年輕人覺得前途黯淡。香港過去多年的繁榮，甚至內地自由行給香港帶來的表面繁榮，這些年輕人並未從中受益。相反，他們看到自己的社區正在消亡，過去光顧的茶餐廳消失了，變為賣奶粉的藥店以滿足內地遊客的需求，最大的獲益者是地產商和擁有店舖的

有錢有勢階層。他們感到無望，於是採取行動，將暴力施加在更加無助和弱勢的人身上。其實，多數自由行的內地人也是弱勢群體，甚至香港水貨客，也只能靠往返深港兩地賺取微薄收入。香港所謂的本土主義者通過製造恐懼或仇恨來實現自己的政治目的。

在 2016 年美國總統大選中，共和黨總統參選人特朗普最大的支持者就是美國白人藍領階層，他不停煽動該階層的恐懼，以獲取他們的支持。這些白人藍領階層在全球化的進程中、在美國製造業向外轉移的過程中失去了工作機會。特朗普反覆向他們灌輸：你們的工作被中國人和墨西哥的非法移民搶走了。他通過煽動仇恨來獲得支持，連教宗方濟各[●]都不齒特朗普這種煽動仇恨者，他說：“任何人如果只想建築高牆，而不是築橋，都不是基督徒。”

我非常尊敬這位教皇，2016 年 2 月 12 日，發生了一件基督教歷史上的重要事件，梵蒂岡的羅馬天主教教皇方濟各，與俄羅斯東正教大牧首基里爾一世，在古巴哈瓦那舉行了歷史性會晤。這是自 1054 年基督教東西教會大分裂以來，兩教領袖首次相聚，此次會晤被視為基督教兩大分支關係改善的重要一步。

我們應該努力地將圍牆打開，將心結打開。那我們到底如何去消弭仇恨，衝破恐懼呢？

● 教宗方濟各（Pope Francis, 1936-2025），2013 年當選羅馬天主教第 266 任教宗，是首位來自美洲的教宗。他以謙遜、簡樸著稱，強調社會正義、環境保護和對窮人的關懷，致力於推動教會改革和促進宗教對話。

擊破圍牆需要良知與人道

1990年冬天我離開德國後，又來到捷克首都布拉格，開始了我人生的第一次揹包行。那時我只知道昆德拉（Milan Kundera）^❶，不知道捷克還有一位與昆德拉齊名的作家，名叫克里瑪（Ivan Klíma）^❷，他在1968年“布拉格之春”^❸後選擇返回並留在了捷克，其作品在隨後的十幾年裏被列為禁書。他有一本很能體現其思想的著作，書名《布拉格精神》（*The Spirit of Prague*）。在這本書中，他告訴我們：“解放人的每項努力，都是將他們從恐懼當中解放出來，是為了創造一種情景，於其中他不再感到他的從屬是一種威脅。權力越兇惡越絕對，它便越剝奪人的自由和造成恐懼。”

克里瑪童年時曾在納粹的特萊西恩施塔特集中營度過三年，親身體驗了絕對權力的恐怖。1968年蘇聯坦克碾碎了“布拉格之春”的改革夢想，隨後而來的是長達二十年的高壓“正常化”時期。克里瑪選擇留在捷克，成為“地下文學”的代表人物，用筆記錄下那種在恐懼中生活的窒息感。“布拉格精神”是什麼？它正是在這種極度壓抑的環境中，捷克知識分子所代

❶ 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 1929-2023），捷克裔法國作家。他以《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等作品聞名，其作品探討人性、政治與存在，風格獨特，影響深遠。

❷ 伊凡·克里瑪（Ivan Klíma, 1931- ），捷克著名作家，曾獲捷克共和國傑出貢獻獎章和卡夫卡文學獎。他的作品以寫實風格著稱，常通過第一人稱敘事，貼近人性與生活，代表作有《我快樂的早晨》《我的初戀》《愛情與垃圾》《我的瘋狂世紀》等。

❸ 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是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第一書記杜布切克推行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改革運動，旨在實現“具有人性的社會主義”。改革擴大了言論和新聞自由，放鬆經濟管制。蘇聯及其華約盟國擔心改革會引發連鎖反應，於8月20日出兵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鎮壓了改革運動，杜布切克被撤職，改革成果被廢除。

表的一種不屈從於謊言、在逆境中堅持內心真理、用文化和思想抵抗暴力的精神。它是一種在恐懼的汪洋中努力維護人性尊嚴的嘗試。

恐懼是權力運作最有效的工具，恐懼來源於無處不在的監視、任意性的逮捕、公開的羞辱、職業和生活的毀滅，以及暴力的威脅。個人在這種環境下，會感到自己像一件隨時可以被替換、被摧毀的物品，毫無安全感可言。極權主義的目標是吞噬社會的一切自治空間，讓國家意志滲透到個人生活的每一個角落——你的思想、你的工作、你的家庭、你的私人談話。任何形式的獨立性都對這種絕對權力構成潛在威脅，因此必須被剷除或控制。人們開始進行自我審查，隱藏自己的真實想法，甚至參與公開的表演性服從。這創造了一種“普遍性的偽善”，每個人都在扮演系統要求的角色，從而進一步鞏固了權力的表面合法性，但也加深了人與人之間的不信任和個體的內在孤立與恐懼。

在此跟大家分享我的讀書心得，這是我想分享的第一本書，所以擊破圍牆需要良知與人道。

有多少人看過《焦點追擊》(Spotlight)^❶ 這部影片？我是記者出身，曾在 1996 年榮獲“500 位最有影響力的美國亞裔人士”榮譽，其中一個原因就是表彰我長達一年時間內在美國英文媒體上發表跟蹤報導中國偷渡客的調查報道。1992 年，中

❶ 《焦點追擊》(Spotlight) 是一部根據真實事件改編的電影，講述了 2001 年《波士頓環球報》“焦點新聞組”調查天主教會神父性侵兒童醜聞的過程。記者們克服教會阻撓，發現超過 70 名神父涉案，最終揭露真相，引發全球關注。該片獲得第 88 屆奧斯卡最佳影片和最佳原創劇本獎。

國非法移民在美受到極大關注，偷渡船“金色冒險號”在紐約擱淺，成為美國的重大新聞事件。

《焦點追擊》這部電影，講述了《波士頓環球報》的編輯和記者調查美國神父性侵男童事件。他們最初獲得線報，以為只是單一事件，但在調查中發現類似的醜聞在美國不少教會時有發生。他們決定深入調查，為何這樣的罪行可以長久持續地發生而未被制止，到底羅馬教皇是否知情，制度上有否縱容和包庇這些神父？作為一群有良知的記者，他們最終把矛頭對準了梵蒂岡，而非簡單調查幾個甚至上百個神父，經過多年嚴謹收集證據，他們發現天主教教會在體制上包庇與縱容這一違法行為。這一調查結果產生了巨大的威力，這就是新聞監督的力量。

2016年，新華社原記者楊繼繩被哈佛大學尼曼學會（Nieman Fellows）授予“萊昂斯新聞良知與誠信獎”（Louis M. Lyons Award for Conscience and Integrity in Journalism）。他獲獎的原因是 *Tombstone: The Great Chinese Famine, 1958-1962* 這本著作。他曾說：在中國內地做記者是非常難的，他決定去報導“舊聞”。這本書寫的舊聞是“大躍進”後發生的大饑荒，他用了相當長的時間，查閱了許多檔案，採訪了很多人的，證明這場饑荒不僅是天災，更是人禍。

讓我更加感動的是醫生高耀潔，她曾獲得2003年中央電視台“感動中國十大人物獎”。因為她，因為《血災：10000封信》一書，讓世界了解到中國河南的艾滋病感染者並非通過性傳播或毒品感染，而是通過血液傳播感染。在河南，這個秘密被隱藏了很久，導致患者得不到及時的治療和救助，一位

老人、一位有良知的醫生邁出了艱難的一步，世界才知道了真相，患者才有了希望。2001年，“全球衛生理事會”提議授予高耀潔“喬納森·曼恩世界健康及人權獎”（Jonathan Mann Award For Global Health and Human Rights），聯合國秘書長安南出席了頒獎典禮。安南說：“高醫師未能出席今天的頒獎儀式，我深表遺憾。她是一位在中國農村從事預防艾滋病宣傳教育的女性活動家。”所以，擊破圍牆離不開每一個有良知的人的努力。

伊凡·克里瑪（Ivan Klima）在《布拉格精神》（*The Spirit of Prague*）裏寫到：“一個建立在欺騙基礎上的制度，要求人們虛偽，要求外在的一致，而不在乎是否出於內心的深信；一種害怕任何人詢問有關自己行為的意義的制度，不可能允許任何人向人們說話時，達到如此迷人的甚至可怕的徹底的真誠。”在圍牆裏面，真實常常是不存在的。

這讓我想起了《1984》^❶這本書。這是一本政治寓言小說，寫在1948年，書名叫《1984》。書中有三個國家：大洋國、歐亞國與東亞國。大洋國裏有四個部門：負責戰爭的和平部、負責維護社會秩序的友愛部、負責文化與教育發展的真理部、負責經濟的富裕部。主人公史密斯在真理部負責改寫歷史，將過去的歷史修正為符合目前黨的需要官方版本，滿足當政者的需求，以體現大洋國政府的無所不知。他不停地重寫記錄，偽

❶ 《1984》是英國作家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 1903-1950）創作的一部反烏托邦小說，發表於1949年。小說描繪了一個極權統治下的未來世界，政府通過思想監控、歷史篡改和語言控制等手段，對民眾進行絕對統治。主人公溫斯頓·史密斯在“老大哥”的監視下，試圖反抗壓迫，但最終失敗。這部作品深刻批判了極權主義和思想控制，成為經典的政治寓言，對後世影響深遠。

造照片，並將原始資料扔進“忘懷洞”。在大洋國裏，每一個人的生活都被監視，所以書中有一句話讓人毛骨悚然：“不管你走到哪裏，老大哥都在看着你。”

主人公和他的愛人最終都進了監獄，不停接受洗腦，最後相互出賣了對方。雖然這是一部政治寓言小說，但我們在現實生活中看到了小說中的世界。書中的主人公面對這樣的制度顯得無力和無奈，不過他說出了一句從絕望中重拾勇氣的話，這句話給我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他說：“如果你感到保持人道是值得的，即便這不能有任何成果，你也已經戰勝了他們。”

圍牆裏的當權者和作惡者都想讓你的人性泯滅，他們最恐懼的就是你身上依舊殘留有人性。

攻破圍牆需要開放與自信

任何一個國家、任何一個組織、任何一個機構、任何一個人，當充滿自信的時候，你就是開放的，是不會建造圍牆的。這裏給大家講一個久遠的故事，關於唐王朝李世民的故事。

唐朝作為中國歷史上的鼎盛時期，其文化影響力遍及全球，展現出高度的開放性與包容性。伊斯蘭教於唐代傳入中國，據史料記載，這一過程始於永徽年間；景教作為基督教的分支亦於貞觀年間由波斯傳教士引入長安，獲得官方認可；佛教雖源自印度，卻在唐代完成本土化轉型並廣泛傳播。唐太宗李世民執政期間，對這三種外來宗教均採取接納態度，不僅為其提供自由發展空間，據傳李世民還曾研讀景教漢譯經典《聖經》，這種開放政策既彰顯了盛唐的文化自信，也體現了“和

而不同”的治理智慧。相較於將新事物視為異端而排斥的保守態度，具有遠見的統治者更善於採取“拿來主義”。

在中國古代帝王中，如唐太宗李世民這般兼具自信與開放胸襟的統治者實屬罕見。據史料記載，伊斯蘭教創始人穆罕默德曾派遣使者覲見周圍國家的君主，遞交勸說他們皈依伊斯蘭教的《致鄰國君主書》。拜占庭皇帝希拉克略拒絕這一建議；波斯帝國君主霍斯勞二世收到勸信時，更是勃然大怒驅逐來使。然而伊斯蘭教使團抵達唐朝時，李世民不僅以禮相待，更特許其在廣州興建中國歷史上首座清真寺。這一鮮明對比印證了盛世王朝的典型特徵——當國家處於鼎盛時期，其統治者往往展現出開闊的國際視野與文化包容力，正如唐太宗對待外來文明的態度所彰顯的，真正的強大源於自信而非排斥。

我們常常在輝煌的時刻沒有察見脆弱，在盛世的時候沒有察見黑暗。羅馬帝國曾如此輝煌，但很多人都沒有預見到這個帝國會迅速消亡，最後還是被蠻族入侵所推翻^①。今天我們到地中海沿岸國家，看到古羅馬人留下的遺跡，依舊可以感受到羅馬帝國當年的繁榮，但羅馬帝國給我們留下了什麼呢？

威爾斯的《世界簡史》^②（*A Short History of the World*）是一部很不同的歷史書。我想引用一整段《世界簡史》對羅馬帝國

① 公元 476 年，日耳曼將領奧多亞克廢黜了西羅馬帝國的末代皇帝羅慕路斯·奧古斯都，標誌着西羅馬帝國的正式滅亡。這一事件是羅馬帝國長期衰落的最終結果，其背後是經濟衰退、政治腐敗、軍事弱化以及蠻族入侵等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

② 赫伯特·喬治·威爾斯（H.G. Wells, 1866-1946），英國著名科幻小說家、社會評論家。他以科幻小說聞名，代表作有《時間機器》和《世界大戰》等。《世界簡史》是威爾斯的通俗歷史著作，首次出版於 1920 年。該書以簡潔生動的筆觸敘述了從史前時代到 20 世紀初的世界歷史，涵蓋政治、文化、科學等多方面內容，旨在為普通讀者提供一部通俗易懂的世界歷史讀物。

的總結：

當時的羅馬，幾乎不存在所謂的家庭生活，而那種節制的、在文化思想上積極進取的家庭實在罕見。學校和學院也很少，而且遠離人們的生活區。自由意識和自由精神，在這片土地上幾乎絕跡。羅馬儘管給後人留下了令人驚訝無比的寬闊的大道、燦爛無比的建築遺跡以及有據可循的權勢和法律，但這些都不能掩蓋一個事實：這些表面上的輝煌是建立在對人民意志的禁錮、才智的束縛和慾望的扭曲和削弱上的。甚至是那些統治着這個被征服的龐大帝國（強迫奴隸勞動的王國）的少數統治者的靈魂也一直處於不安、快快不樂中。

在這種社會環境中，自由、快樂心靈的產物，如哲學、科學、藝術、文學等，也會遭到毀滅。社會中，到處都是抄襲和模仿，隨處可見沒有絲毫創造力的藝術工匠以及奴顏媚骨的迂腐學者。然而，與僅輝煌了一百年的雅典壯闊的、無所畏懼的精神活動相比，這個榮耀了四百年之久的羅馬帝國所取得的成就，簡直就不值一提了。在羅馬的統治下，雅典逐漸走向衰落，而亞歷山大的科學活動也即將被戰火中止，人類的精神在這一時期似乎一天天趨於沒落了。

所以今天提起古希臘，我們更多想到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這些著名哲學家。提起古羅馬，自然會想到那些雄偉的建築，元老院，鬥獸場，以及跨越三大洲的殺戮。

這裏我還想分享另外一本書，書名為《叫魂：1768 年中國妖術大恐慌》（*Soulstealers: The Chinese Sorcery Scare of 1768*）^①，是已過世的美國漢學家孔飛力（Philip Alden Kuhn）所著。這本書描述了乾隆年間，盛世達到登峰造極之時，整個清朝的政治與社會生活被一股名為“叫魂”的妖術攪得天昏地暗，百姓人心惶惶，官員疲於奔命，皇帝寢食不寧；揭示了封建王朝背後的官權和皇權博弈邏輯。這位漢學家為何選擇這一事件寫書呢？這恰恰凸顯了他特定的觀察力，他從乾隆盛世的這一事件，看到清朝最終為何無法革新與滅亡。

什麼是“叫魂”？本書開篇即敘述了浙江德清的一位老人，他的姪兒對他刻薄而苛刻，於是他讓石匠將姪子的名字釘在石碑上詛咒他。當時正值 1768 年，浙江、江蘇一帶有很多“叫魂”事件發生，不少人在睡夢中被剪去頭髮，而大清王朝認為剪去辮子是大逆不道之事。當年清軍入關之時，揚州十日、嘉定三屠等慘案均發生在江浙一帶。這些事件逐層上報到乾隆皇帝處，皇帝要求徹查，但徹查之下最終發現不過是烏龍事件。清朝官員眼看事態一發不可收拾，只好找替罪羔羊殺頭了結。

1768 年正是乾隆盛世的時候，官僚統治階層參與了這場庸人自擾的烏龍鬧劇，有的人被殺了頭，有的人丟了官。這本書的獨特之處就在於通過 1768 年發生在中國各地的妖術事件，發現處在盛世的清朝，整個帝國體制已僵化。閱讀之後，你能

① 《叫魂：1768 年中國妖術大恐慌》是美國漢學家孔飛力（Philip Kuhn）創作的歷史學著作，成書於 1990 年。該書以 1768 年清朝乾隆年間發生的“叫魂”事件為背景，講述了當時中國社會各階層對妖術的恐慌與反應，揭示了盛世背後的官僚體系、皇權運作與社會動盪。

在 1768 年預見清朝滅亡的根源。《叫魂》這本書出自哈佛大學歷史講座教授孔飛力之手，與《萬曆十五年》有相似之處，讀來引人入勝。

自信是什麼？美國人 1853 年用武力強迫日本人打開國門時，日本人決心革新，開放下田、函館兩個港口，促成了日本的倒幕運動，在 1868 年實現明治維新，開啟了日本近代化的進程。在這之後，日本 1895 年打敗大清王朝，1905 年又在日俄戰爭中戰勝俄國，躋身列強，成為亞洲首個現代化國家。日本在短短不到半個世紀的時間裏從弱變強，靠的是什麼？當然，我們要譴責日本人的侵略性，但也要分析大和民族為何能在半個世紀裏崛起，讓本國從被人欺凌的弱國變為列強，就源於他們敢於接納新事物，敢於改革舊制度，這就叫做“自信”。如果大家永遠不敢走出這堵圍牆，最終的命運是什麼？就是像瑪雅帝國那樣終將消亡。

開放的社會必然是多元的，也必然是包容的

一個開放的社會是多元的。在“9·11”恐怖襲擊發生之後，喬姆斯基（Avram Noam Chomsky）^❶寫了《9·11》一書，美國的一位知識分子無懼無畏地告訴大家：“9·11”的肇因不是基地組織，而是美國政府的外交政策所導致。喬姆斯基是第一個用文字、用思想向美國當權者挑戰的人。要知道，彼時美

❶ 喬姆斯基（Avram Noam Chomsky, 1928-），美國語言學家、哲學家、政治活動家，現代語言學的最重要人物之一。

國上下出於愛國情懷，不僅普通民眾三緘其口，就連我熟悉的那些以獨立思考著稱的記者、評論家，以及富有智慧的自由派知識分子，也幾乎一窩蜂地支持美國政府的政策。正是在這種集體亢奮的氛圍中，他率先站出來揭露了美國政府的虛偽面目，無疑需要非凡的勇氣！所幸在美國，這麼一位“非主流”的學者不會因這樣的言論受到迫害和禁錮，儘管美國右派從未停止對他的圍剿。

如果喬姆斯基是用文字喚醒美國人，斯諾登^①則是用行動喚醒美國人。斯諾登讓美國人意識到：“9·11”之後的美國陷入了“圍牆”的心態，美國政府對公民自由的侵犯傷害了美國人，讓大家生活在恐懼當中，美國失去了道德制高點。但像斯諾登這樣被美國政府通緝的“罪犯”，有關他的記錄片《第四公民》竟然可以在奧斯卡上獲獎，也是難能可貴。

對現存社會的批判與思考是一個知識分子的權利和義務。我去年閱讀了克林頓時期的美國勞工部長，現任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教授瑞奇（Robert B. Reich）^②的著作《拯救資本主義》（*Saving Capitalism: For the Many, Not the Few*）。這位前政府高官竟將矛頭對準美國政府，尖銳地批判美國已經被資本霸權控制和壟斷，美國政府的決策加劇了壟斷，導致貧富兩極化日益惡化，並嚴重傷害美國的中產階級，影響了美國社會的發展和資本主義制度的自新。

① 斯諾登（Edward Snowden, 1983—），曾是美國中情局及國家安全局技術分析員，2013年他向媒體披露了美國“棱鏡計劃”，曝光了美國政府對全球的大規模監聽行動。

② 羅伯特·瑞奇（Robert Reich, 1946—），美國勞工部前部長、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公共政策學教授，著有《拯救資本主義》等書。

一個開放的社會都有共同的特點，那就是尊重多元的意見。

已故的馬里蘭大學教授奧爾森（Mancur Olson）^❶ 撰寫了《國家的崛起與衰弱》（*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 Economic Growth, Stagflation, and Social Rigidities*）一書，明確提出為什麼利益集團、遊說集團不利於國家發展。少數人的利益受到保護，最終會影響國家的競爭力。但很多人沒有意識到遊說集團對一個國家產生的影響會如此巨大，因為人們在短期內不會明顯感受到其所作所為產生的負面影響。在他看來，美國強大的工會組織，其遊說活動影響了美國的競爭力。很多社會、很多人因害怕競爭而建造圍牆，保護自己的利益不受損害。所以，圍牆也同樣存在於經濟領域，這樣的圍牆最終會導致一個社會的發展停滯不前。

上面提到的港大發生的事件，就是一座無形的“心牆”，我由此聯想到全球各地建造的各式圍牆和心牆。中東發生“茉莉花革命”後，很多人都說“網上無界”的時代來臨了。我曾以為社交媒體的發展可以打破我們的圍牆，網上社區提供了新的可能，最終會打破地域和時空的限制。不幸的是，如今的現實恰恰相反，人們依舊在網上攻擊、廝殺、謾罵和對立，甚至超過以往任何時期，並以一種新的形式在網上建立圍牆和心牆。

現在打開臉書（Facebook），我們可以看到憤怒、討厭、喜

❶ 曼瑟爾·奧爾森（Mancur Lloyd Olson Jr., 1932-1998），美國經濟學家和政治科學家，馬里蘭大學教授，對制度經濟學領域有重要貢獻。

愛等表情符號，凡是跟自己意見不同的人都會被打成異類。即便在中東“茉莉花革命”時，一些人通過推特（Twitter，現改名為 X）、通過臉書喚醒民眾，現在也倍感挫折。谷歌公司的中東和北非市場部主管戈尼姆（Wael Ghonim）^①就參與其中，這位埃及人寫了一本書《革命 2.0》（*Revolution 2.0: The Power of the People Is Greater Than the People in Power: A Memoir*），對社交網絡的前景表示悲觀。他說：“我五年前認為，如果你想解放社會，你需要互聯網；今天我則相信，如果我們想要解放社會，我們需要首先解放互聯網。”

我們不停地建立圍牆和心牆，但不願去尊重和包容別人。大學需要獨立和自由的思想，實現這一點的基本前提，就是要學會尊重別人的自由，但自由並非無止境。《言辭之間》（*Only Words*）這本書告訴我們語言的暴力不屬於自由範疇，這是美國法律學家和法學教授麥金農（Catharine A. MacKinnon）^②在 1993 年出版的著作。她在書中表示：“我們在爭論時，往往因我們的言詞產生新的鴻溝和圍牆，我們必須意識到不能用言詞製造新的毀謗和歧視。”

圍牆、心牆、心智

圍牆可怕，但心牆更加可怕，這會影響我們的心智。要改

① 瓦伊爾·戈尼姆（Wael Ghonim, 1980-），谷歌中東和北非地區前市場部主管，因利用社交平台推動埃及反政府抗議運動而聞名，著有《革命 2.0》，曾入選《時代週刊》2011 年全球最具影響力人物 100 強。

② 凱瑟琳·A·麥金農（Catharine A. MacKinnon, 1946-），美國著名女權主義法學家、律師和社會活動家。

變心智，必須首先打破心牆。很多時候我們都有一個固定思維模式，“固化心智”就是以為自己不需要努力，不需要改變；說到變化就一定是別人去變化，別人去改變。“成長心智”則相反，你需要持續不斷地努力、需要有不畏挫折的心境。你的激情、你的努力、你的學習可以不斷改變自己。所以，我想給大家介紹的最後一本書是《心態制勝》（*Mindset: The New Psychology of Success*），作者是心理學家和斯坦福大學教授德韋克（Carol S. Dweck）。這本書認為，積極的心態給我們的事業、生活和婚姻都能帶來無限的可能。

說到積極向上、不斷進取的心態，讓我想起孟加拉國的窮人銀行家、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穆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 Yunus）^①。他說過一句話：“我最大的挑戰是改變人的心態。心態有時候很奇怪，我們看事情的角度常常受到我們心態的影響。”尤努斯是孟加拉國經濟學家，開創了“微額貸款”服務，幫助貧困創業者獲取資金，推動社會企業發展，尋找到支持窮人的全新貸款模式和商業模式。

另一位來自孟加拉國的美國人薩爾曼·可汗（Salman Khan）^②，畢業於麻省理工學院和哈佛商學院。這位 70 後在 2000 年離開收入可觀的對沖基金，創辦了可汗學院（Khan Academy），2004 年開始上傳教學視頻，2009 年全職投入可汗

① 穆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 Yunus, 1940-），孟加拉國經濟學家，孟加拉鄉村銀行創始人，被譽為“窮人銀行家”。2006 年獲諾貝爾和平獎，2024 年 8 月擔任孟加拉國臨時政府首席顧問。

② 薩爾曼·可汗（Salman Khan, 1976-），美國教育家、企業家。2006 年創立“可汗學院”，通過免費在線視頻課程普及教育，覆蓋數學、科學等領域，惠及全球學習者，推動了教育公平與創新。

學院，提供免費在線教育資源。如今，該平台涵蓋多領域課程，每月服務數百萬人。現在全世界使用他的網上免費課程的人不計其數，僅在美國就有數千位中學老師藉助可汗學院的免費課程教課，讓遠在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學習者也從中受益。有投資者想要幫助可汗學院上市卻被他拒絕，他就喜歡用一部電腦，一個人給學習者提供免費服務。

保持積極與樂觀的心態離不開我們的思維，一個人的心智模式決定了他的命運。聖雄甘地說過：“確保你的思想積極，因為你的思想會變成你的言辭；確保你的言辭積極，因為你的言辭會變成你的行為；確保你的行為積極，因為你的行為會變成你的習慣；確保你的習慣積極，因為你的習慣會變成你的價值；確保你的價值積極，因為你的價值會成為你的命運。”

確保我們的思想積極向上，離不開睿智的思考，這體現了學習的重要性。伊凡·克里瑪（Ivan Klima）說過：“讀書的目的是什麼，無非是心智的改變。”希望大家能夠在學習的旅程中收穫心智的成長，擁有更好的未來。

AI 時代的學習力與創造力

這本書，彙集了我過去十多年間以“學習”為主題的演講與思考。

我將它命名為《心牆·圍牆——開放性與創造力》。其中探討的，多是教育的本質與目標、學習的目的與人才的培養。它源自我對教育持續不斷的追問，而貫穿始終的核心是：如何拆解內心的壁壘，真正地彼此理解；如何推開外部的圍欄，自由地創造新生。

教育的內核，或許正在於此——它不是知識的灌輸，而是心靈的打開；不是系統的封閉，而是生命的綻放。願這些思考，能成為一扇窗，或一把鑰匙。

本書付梓之際，人類正站在一個時代的臨界點上。AI 時代的到來，不僅衝擊着舊有的秩序，更需要全新的學習範式與溝通倫理，也迫使我們對學習的目的進行再思考：技術應如何促進更有意義的互動，為打破隔閡提供可能？這恰恰回到了本書的核心——真正的教育，旨在培育技術無法替代的創造力和開放心靈。

變革的臨界點：人類生活的範式轉移

AI 革命是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一場變革，它帶來的不僅是技術迭代，更是文明認知的根本躍遷。

此前的工業革命，皆可視為人類能力的“延伸”：第一次工業革命是“動力”的解放，蒸汽機取代人力與畜力，實現生產力的初次飛躍；第二次工業革命是“電力”的普及，能源得以遠距傳輸，生產與社會形態隨之重塑；第三次工業革命是“數力”的興起，半導體、電腦與互聯網將信息數字化。而 AI 革命，核心在於“算力”，卻遠不止於算力。人工智能、大數據、物聯網與量子計算等技術，共同推動人類從“執行指令”邁向“自主生成”，從“增強體能與算能”進入“賦能認知與創造”的新階段。

過去的技術革命，始終由人類主導，機器按人設定的邏輯運行；如今，AI 開始學習、判斷甚至創造，其決策過程往往超越人類直觀理解的範圍。這不僅是工具的升級，更是主體與工具關係的重構——人類首次面對一個能“思考”的協作體，這也正是此次科技革命在本質上區別於以往的關鍵所在。

“動力、電力、數力、算力”構成工業革命的四部曲，勾勒出一條從解放體力、高效輸能、處理信息到智能驅動的演進脈絡。過去的三次工業革命，本質上是對人類體能與計算能力的延伸與放大：蒸汽機與機械賦予我們超越肌肉的力量，電腦則賦予我們超越人腦的運算速度與存儲容量。然而，這一切始終以人為核心決策者，機器只是執行人類預設的規則與流程。

正如蒸汽機解放了人的體力，個人電腦也曾解放人的智力

與創造力。而 AI 革命，則是對人類認知與創造能力的延伸與挑戰，標誌着從“體能延伸”邁入“智能賦能”。它的發展迅速，每一次突破都在推開一扇通往未知的大門。

AI 正在成為人類的“第二大腦”。它不僅是工具，更是智能的延伸；不僅學習知識，更能創造知識。我們正站在一條新的“解放之路”上：它將拓展我們的智慧邊界，並可能重新定義何為學習、何為創造。

這場轉型的本質，是推動教育的重心從“知識傳授”向“潛能激發”轉變，通過提供個性化的成長體驗與可信的能力認證，重塑教育不可替代的社會與經濟價值。

AI 衝擊傳統的教育模式

首先，是對“知識與學習認知”的衝擊。

長久以來，學習被視為從權威渠道獲取知識的過程——無論是教師講授、教材閱讀，還是文獻查閱。知識獲取意味着查找、記憶與理解這些既定內容。

生成式 AI 能創造內容、整合信息，甚至模擬推理。這是對數百年來“知識傳授”傳統的背離。生成式 AI 不僅改變了學生學習的內容，更從根本上改變了人們認識世界的方式。

其次，是對“知識權威與來源”的衝擊。

生成式 AI 能夠就任何主題生成看似權威的文本，但其內容可能並無可追溯的來源，而是基於海量數據統計得出的模式。它既能高效整合信息，也可能摻雜“幻覺”或虛構內容，並將其包裹於真實的歷史背景與專業術語中，令人難辨真偽。

當“信息來源”變成一個無法完全透視的 AI 系統時，我們不得不重新審視：何為“原創思考”？何謂“真實”？傳統的來源評估、邏輯推理與證據權衡能力，因此面臨根本性的挑戰。

第三，是對“學習過程與價值”的衝擊。

學習的價值，本就蘊含在過程之中——在反覆構思中梳理邏輯，在試錯中解決問題。這個過程塑造了我們的思維與韌性。

然而，AI 能瞬間跨越所有掙扎與痛苦，直接呈現一個“完美”結果。這使學習容易淪為只重成果、忽視過程的空心行為，“過程價值”被剝離，僅存“結果價值”。

若學生將 AI 生成的報告視為己出，那麼他所完成的不過是一次信息搬運。當越來越多人依賴 AI 的解釋來印證自身觀點，而非通過獨立分析形成判斷，傳統以“提交報告”作為“學習成果展示”的模式被徹底顛覆。

最後，是對“創造力定義與歸屬”的衝擊。

創造力曾被認為是人類獨有的光芒，源於個人經驗、情感與意識的瞬間迸發。文藝作品更被視為作者靈魂的延伸。

然而，AI 可模仿任何風格，生成前所未有的圖像與文本，這迫使我們追問：創造力的核心究竟何在？誰是真正的創造者——是下達指令的人、開發模型的工程師，還是被用於訓練資料的無數創作者？

生成式 AI 正將我們從一個“知識匱乏”的時代，帶入一個“注意力與判斷力匱乏”的時代。在這場轉變中，教育必須重新尋找其立足之處。

如何適應未來的學習？

過去，學習的重心在於記憶知識、掌握技能、給出答案。生成式 AI 並未讓學習失去意義，而是令低層次的認知勞動——如記憶與復述——失去優勢。未來的學習，將真正的高階能力推向舞台中央：批判思考、獨立判斷、創造突破與倫理抉擇。這要求我們的教育體系與個人學習方式，必須完成一次深刻的範式轉移。

AI 時代的教育，必須從知識灌輸轉向智慧培養，即從“記憶知識”走向“進化能力”。死記硬背已成為歷史，真正的智慧與思維層次才是方向。未來不屬於人機對抗，而在於人機互補共生。人類負責提供意圖、倫理與創造力，AI 則延伸認知、處理與反覆運算能力，二者融合方能構建完整的認知進化體。

超級人工智能將比人類大腦聰明一萬倍（孫正義語）。AI 在邏輯、推理、計算與模式識別上已具顯著優勢，人類則在目標設定、倫理界定、問題定義與價值判斷上不可替代。當 AI 成為強大的“外部大腦”，教育的核心就應從灌輸知識，轉向培養提出戰略性問題的能力。

一個好問題，是激發 AI 潛能的鑰匙。未來的學習重點之一，是學習者如何向 AI 提問，以催生最具價值的回應。人類必須運用我們獨有的直覺與意義感知能力，提出引領方向的關鍵問題，並將 AI 的輸出轉化為現實世界中有意義的創造與行動。直覺並非憑空而來，它源於人類具身化的經驗、情感體驗與對不確定性的包容，正是這種能力，引導我們提出 AI 無法

自主構想的問題。

因此，教育正在為此重塑。學習者所提的問題應具備：

開放性：引導探索，而非尋求唯一答案；

連線性：貫通多領域知識，形成新的知識組合；

反思性：能對 AI 的答案持續追問與挑戰。

即便身處 AI 革命之中，教育仍離不開那些恆久的根基：人文素養、明辨思維、激勵他人的能力，以及一顆具備同理的心。

AI 時代最重要的價值是什麼？

AI 時代，何為最重要的價值？答案或許藏在四種核心能力之中：理解力，能穿透信息表層，洞察本質內涵；判斷力，能在混沌中辨識真偽，作出清醒抉擇；創新力，能突破思維定式，創造新的意義；道德力，能在技術進程中守住倫理底線，秉持人文關懷。

理解力，離不開人文素養的根基，核心在於迷茫中的自我認知。

AI 擅長“快思考”，人類則必須深耕“慢學問”。未來的學習者更需從科學、哲學、歷史與文學中汲取養分，獲得深度理解與複雜判斷的能力。理解力正從“接收信息”轉向“建構意義”，將碎片置於具體的歷史、文化與社會脈絡中，理解其真正意涵，甚至接納全然不同的視角。這不僅幫助我們看見事物間的複雜關聯，更能理解技術如何牽動經濟、政治與社會的整體演進。而最終，理解力也指向對自我與他人的深刻覺察：認

識自己的情緒、動機與偏見，並真切體察他人的感受與立場。

判斷力，離不開明辯思維的羅盤，核心在於噪音中辨識方向。

面對 AI 生成內容的氾濫與信息轟炸，判斷力已成為生存之本。明辯思維的核心在於“駕馭而非盲從”：主動審視信息來源、動機與證據，清晰區分事實與觀點，洞察邏輯謬誤與演算法偏見。更深一層，它體現為在模糊與不確定的情境中作出審慎決策的能力——能綜合有限信息、價值觀與長遠影響，負責任地判斷，並找出解決之道。最關鍵的是，判斷力始終包含對自我的持續反思：不斷檢視自身的思維慣性與認知局限，從而在智慧洪流中保持獨立與清醒。

創新力，離不開跨學科的洞察，核心在於打動人心的故事。

當重複性勞動被自動化，真正的價值便來自創造。創新不僅是技術的突破，更是情感與意義的編織——隱含打動人心的故事、引發共鳴的體驗、構建有溫度的連結。在 AI 時代，跨學科的洞察與跨領域的連結尤為關鍵。創新是搭建“無關事物”之間的橋樑，這不是“科技+人文”的簡單疊加，而是要我們既理解演算法的邏輯與邊界，又深諳人類的情感、需求與倫理。從 AI 輔助醫療到沉浸式學習，再到人機共創藝術，所有深度創新都發生在學科交匯處，其驅動力正是人類重構問題的創造力。

道德力，離不開同理之心，核心在於價值判斷與情感智慧。

我們必須將對人的尊嚴、社會福祉與生態永續的原則，內

化為科技創新的內在尺度。AI 時代，同理心是人類不可替代的核心競爭力。當 AI 提供高效選項時，依據何種價值觀進行選擇？是效率優先，還是公平優先？是隱私重要，還是安全重要？AI 能類比對話、分析情緒數據，卻無法真正體會情感背後的生命經驗、文化語境與倫理重量。這種“價值判斷”的能力，使我們能辨別“能夠做”與“應該做”的界線，在具體情境中作出有人性溫度的選擇。這正是人類在智能協作中不可替代的角色：以倫理自覺與情感智慧為導航，引領科技向善。

AI 時代的學習，其終極目標在於培養技術無法類比的深度人性——那種能理解複雜世界、在模糊中明辨、創造美好並始終堅守善意的素養。這一切，離不開終身學習的熱情、勇於探索的膽識，以及持續不斷的道德反思。

在這個劇變的時代，我們更需回歸教育的根本：打開心靈、促進理解、保持探索。唯有如此，人類才能擁抱開放的心態與創造的精神，推倒心牆，拆掉圍牆，持續守護並點亮那一簇獨屬於我們的、生生不息的創造之光。

是為跋。

劉寧榮

2026 年 5 月